

殊途同归: 杨昌济与徐特立教师生涯转型的路径及意义

蒋纯焦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杨昌济与徐特立早年为乡村塾师,居于底层,忙于生计,在清末教育变革中共同经历了教师生涯的转型,但各沿不同的路径展开:杨昌济在新政兴学时考取官费留学,负笈日本、英国,从传统举子转变为新潮知识分子;徐特立通过自学和师范学堂短期进修,从旧式士子转变为新型教师和办学。民国初年,二人命运交集,同为师范之师,致力于培育青年一代,堪称青年导师。杨昌济与徐特立通过身份转变,成功实现了人生逆袭,从底层塾师成长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反映出教育变革既对教师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教师成长提供了新的机会,只有顺应时代,主动应对,才能实现人生转变与事业成就的双丰收。

关键词: 近现代; 杨昌济; 徐特立; 教师生涯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615(2021)06-0018-07

DOI: 10.15958/j.cnki.jywhlt.2021.06.003

中国传统教师职业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为数不多的中央和地方官学中的教师,由朝廷选派或地方长官任命;二是数量庞大的民间私学教师,少数人供职于私人办的书院,大部分活跃于私塾,身份是塾师。20世纪初,中国教育急剧开始从传统到现代转型,建立新式学校系统和行政系统,教师的知识结构、工作场域、工作方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改变,官学中的教师依托行政体制,可能在书院改学堂中获得留用,也可能获得体制内的其他升迁机会。那些从私塾中走过来的教师,如何在新教育中立足,是一个必须自主应对的生涯问题。不能融入新教育的,要么随私塾走向没落,要么失业或改业。当然,教育转型在瓦解传统教育的同时,也给了塾师们转变教育身份的机会,只有跟上时代步伐,才能在新教育中立足。著名教育家杨昌济(1871—1920)和徐特立(1877—1968),在19—20世纪之交,只是生活于内陆乡村地区的两位普通塾师。面对清末中国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急剧变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回应,成功地实现了教师生涯从旧到新的转型。比较杨昌济和徐特立教师生涯转型

的不同路径,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近现代教育家成长的认识,揭示教师生涯与教育变革的关系。

一、不同出身下相同的起点——乡村塾师

杨昌济和徐特立均为今湖南省长沙县人,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时处洋务运动中期。杨昌济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今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出身书香门第,高祖、曾祖都是国子监生,祖父杨万英为县学生员,父亲杨书祥困于场屋,捐了个贡生^{[1]-2}。徐特立生于善化县五美乡荷叶墩村(今长沙县江背镇特立村),出身寒门,祖上不显,父兄务农,勉强度日,4岁时母亲去世,家庭陷入困顿,与妹妹由外祖母抚养。

清末新政以前,中国基础教育的主体是民间私塾,尽管教会学校已经有所发展,但数量极为有限,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广大青少年上学读书基本还是进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内陆地区尤其如此。杨昌济父杨书祥就是一位塾师,他7岁发蒙,就以父为

收稿日期:2021-06-23

作者简介:蒋纯焦,男,湖南衡阳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

师,“入学即受庭训,未尝就外傅,凡经史词章之学,皆书祥公所亲授。”^{[2]383}杨昌济年幼即遭变故,9岁时母亲离世,14岁时父亲辞世,虽童年不幸,但学业并未中断,1889年考取县学生员(俗称秀才),可谓少年得志。徐特立入学较晚,到9岁才进蒙馆^{[3]333}。徐特立师从多人,15岁时居然换了个和尚做老师,“他除教我读八股文外,还教我读佛家的禅宗语汇录。”^{[4]336}16岁时,徐特立家因祖母去世而陷入贫困,学业中断,时为1893年。

甲午战争前夕,杨昌济与徐特立相继开始职业生涯。杨昌济1890年秋应乡试不第,此时已娶妻生子,需要挑起养家的重担,1891年在家乡设馆授徒,时年20岁。他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5]50}徐特立学业中断后即面临生计问题,他以行医等谋生,时年16岁^{[6]6}。徐特立19岁时决定改行去当塾师,认为这样既可以谋生,又可以读书^{[4]337}。

在传统社会,读书人以塾师为业是一个普遍现象。据研究,明代生员的职业选择中,首选便是“训蒙处馆”^{[7]297}。到19世纪晚期,仍有约40%的绅士以塾师为职业^{[8]106}。据估算,全国塾师总数达300多万,是教师队伍的主体^{[9]88}。塾师职业没有制度化的资质要求,读书人可以自由出入,这给底层士子解决生计问题提供了方便。虽然同为乡村塾师,但杨昌济与徐特立又有不同:杨昌济中过秀才,拥有功名,居于塾师职业的上层;徐特立是童生,处于塾师职业的底层。据张仲礼研究,清末有生员以上功名的塾师,年收入约100两银子,没有功名的塾师不足50两^{[8]101}。杨昌济的束修应当不低,但他在经济上可能并不宽裕,其兄杨昌运困于烟癖,长卧家中,杨昌济感念兄嫂抚育之恩,誓不析居,“岁岁课徒,时奉束修以济其乏”^{[10]2}。徐特立则因为束修极低,“在物质生活上受到很大的痛苦。教蒙馆十年,总共只得到二百元左右。开始教书的第一年只得三串钱,合大洋还不够四元。”^{[11]141}

家有四斗粮,不做孩子王。塾师职业虽然清苦,但有一个莫大的便利,可以一边养家糊口,一边读书应举,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向上流动。因此,每个塾师都怀着同样的人生梦想——“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杨昌济多次应本省乡试,曾放下教职专门到书院研习义理和制艺,比如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乡试落第后再回乡教塾。徐特立进不了书院,

就在教塾之余,晚上到离家七八里的一处经馆,听王砚秋讲四书五经和八股时文,做着“得翰林”的美梦^{[12]9}。

二、追求新知的不同选择——本土与出洋

维新时期,中国社会大转型初露端倪,一向闭塞的湖南后来居上,“风气日开,较之江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13]85}。1897年,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首批招生40人,隔年招考内课生78人、外课生70人^{[14]64-65}。范源廉、蔡锷、杨树达等曾考入时务学堂肄业。省城之外,地方官绅亦联合办学,计有浏阳算学馆、新化实学堂、宁乡译算学堂、浏阳致用学堂、黔阳宝山校经精舍、靖州算学堂、长沙任氏正蒙学堂、郴州经济学堂、常德明达学堂、长沙正始学堂等^{[15]174-185}。各地书院也纷纷增设算学、译学、舆地、格致等新式学科,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杨昌济与徐特立同众多湖湘子弟一道,接受维新思想的洗礼,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开启求新之旅。杨昌济1898年入岳麓书院,拜山长王先谦为师^{[2]196-198}。虽然没有投考时务学堂,但他加入了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组织的南学会,曾在《湘报》上发表南学会的命题作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杨昌济还参加了“不缠足会”,主张男女平等。变法失败后,杨昌济退隐乡里,依旧设馆授徒。但他读书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其日记说“余之自课凡有六焉:日记一也,《皇朝经世文编》二也,《御批通鉴辑览》三也,《宋论》四也,闾墨五也,英文六也。”^{[10]16}

徐特立的人生在维新时期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写了十多篇八股,满怀信心地向当地举人陈云峰求教,希望得到指点。不料遭到当头棒喝,陈云峰劝他不要把精力消耗在八股空言上,多读些有用的好书,并赠送徐特立一把纸扇,扇面题写道:“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但书即师也。”^{[3]333}徐特立受人点拨,决定改弦更张,尝试学习现代西方分科之学,包括地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他制定了“十年读书计划”,每年将教书所得全部用于购

· 教育史论 ·

书,“大概十年可以读通,十年也必破产”^{[4]338}。

1901年起,清廷开始施行新政,兴办新式学堂,颁布现代学制,废除科举考试。时代剧变之下,教育转型的大幕迅速开启,塾师杨昌济和徐特立的人生因际遇各异,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转变。

新政兴学,首要问题就是缺乏师资,朝廷及各地选派了大量留学生去日本学习师范。1902年秋,湖南巡抚俞廉三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合作,选派湖湘学子赴日,俞廉三从当年乡试(秋闱)落卷中挑出部分士子参加留日选拔考试。杨昌济参加了本科乡试,未中,但有幸在留日资格考试中被录取。1903年春,杨昌济经上海乘船赴日,同行者有陈天华等人,加上自费留日的朱剑凡等,共11人^{[14]816}。杨昌济抵达东京后,先入专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906年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8年,杨昌济的好友、族人杨毓麟担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的秘书。杨昌济因杨毓麟之便,于1909年到英国,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攻读伦理学。

杨昌济负笈远游时,徐特立经过数年自学新知,知识结构完成了从传统经学到现代科学的转变。他尤其喜好钻研数学,能将古代算术与现代数学统一起来,并以此自得,他说“我的数学不成一家,就破除了一切成法,反对把算术和几何截然分开,反对教几何从离开立体的平面起,而使点线面成为纯思想的东西。……我快乐得很,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还是在乡下教蒙馆。”^{[11]141}1904年,徐特立因经济窘迫,预定的“十年读书计划”难以为继,他参加了最后一届童生考试。此时八股文早已废除,改试策论,并加试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徐特立得益于自学新知,在3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初试名列第19名,声名鹊起,束修大大提高,“年金由十四串升到六十串,一跃四倍。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胜利了。”^{[4]339}但徐特立并没有因经济改善而固守塾师职业,癸卯学制颁行后,他认识到大规模发展新式教育必然急需新型教师,便于1905年2月投考周震麟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堂,从塾师变成了师范生。

杨昌济和徐特立在教育转型的关键节点积极应对,抓住机会,先后舍弃塾师职业,转变身份,学习师范,以便将来在新教育中立足。不同的是,杨昌济获得官费留学资格,人生道路豁然开朗;徐特

立通过长期自学,掌握了新式学科知识,再通过速成师范的短期进修,也赢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三、新教育中的不同角色——“长沙王”与名教授

晚清兴学堂、废科举、立学部等一系列教育革新急剧地改变着读书人的命运,也给弄潮儿提供了走到教育前台的机会。徐特立1905年在速成师范学习4个月便结业了,一扫教蒙馆时“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顿,积极创办新式学堂,先与姜济寰、何雨农等人在梨梨乡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堂——这是长沙县最早的小学,后又与熊瑾玎、唐怡臣等在五美乡办了一所初等小学堂^{[4]340}。1906年春,徐特立应朱剑凡(原名周家纯)之聘到长沙周氏女塾任教,主教国文,兼教地理、历史、数学、化学,集多门课程于一身。当时男女之防甚严,讲台前挂着帷幕,名曰“垂帘施教”,徐特立到校后,大胆革除这一陋习^{[12]20}。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确定了女子教育在新式教育中的地位,周氏女塾便改名为周南女学。1910年春,徐特立继续寻求教育新知,到上海参加俞子夷举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最新的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训练班结束后,又自费赴日本考察小学教育。

徐特立花半年时间到上海、日本转一圈之后,仍回周南女学执教,创办了湖南最早的一份教育刊物——《周南教育》周刊^{[6]9}。1911年,周南女学更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堂,设师范部、中学部、小学部及幼稚园,徐特立出任师范部主任教员兼小学部主事^{[11]142},不久又担任校长^{[4]342}。由此,徐特立将精力转向师范教育,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并先后在第一师范学校、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教。徐特立自豪地说“长沙县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所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11]143-144}

正当徐特立在民国初年热火朝天办师范的时候,杨昌济经过长达10年的海外留学,于1913年春回国。他有两个选择:一是湖南都督谭延闿请为教

育司司长，二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请为教授。杨昌济毅然舍弃了从政的机会，欣然回归教师身份，10年前是私塾教师，10年后为师范之师。与徐特立擅长于办学实践不同，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讲授哲学、伦理学（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并自撰讲义，计有《论语类钞》《修身讲义》《教育学讲义》等。《教育学讲义》重点介绍“海尔巴德”（今译赫尔巴特）学说^[16]。在湖南高师任职之外，杨昌济还在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四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等校兼课。

杨昌济游学10载，名重一时，曾应邀出任长沙教育会会长，因不满教育界新旧各派的明争暗斗，旋辞去会长之职，与黎锦熙合办《公言》杂志。后由于黎锦熙北上教育部供职，《公言》杂志只出3期便停刊了。杨昌济还在主流杂志发表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如《宗教论》、《改良家庭制度札记》（均刊于1915年《甲寅》杂志第1卷第6号）、《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1916年《东方杂志》第13卷第2、3、4号，后收入《东方文库》，题为《西洋伦理之义述评》）、《治生篇》（1916—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4、5号）等。杨昌济有感于中西文化强烈冲撞，萌发融贯中西、创立学派的宏愿。据黎锦熙日记1915年12月14日载，杨昌济尝言“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辟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17]^[19]杨昌济期待中学与西学从冲突走向融合，走宋代理学融合儒佛之路，别创新学派。这一见解极其高明，超越了中学与西学的纷争，指明了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1917年，教育部强力推行师范区制^①，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令停办。杨昌济曾致信教育部长范源廉，希望续办湖南高师，但努力失败。1918年夏，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主讲伦理学和伦理学史。其时，北大作为新文化的策源地，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杨昌济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与胡适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深入钻研中外哲学、伦理学，一年内出版两部重要译作《西洋伦理学史》（日本吉田致静著）和《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德国Theodor Lipps著）。1919年秋冬，杨昌济因积劳成疾，居西山卧佛寺疗养，1920年1月17日不幸逝世，年仅49岁。徐特

立闻讯，撰写挽联“海内失人师，岂为私交方一恸；湘中多厄运，应知精魄亦难安。”^[18]^[23]

杨昌济北上之后，徐特立也于1919年离开长沙，在其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感召之下，以“老学生”的身份赴法勤工俭学，到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7年5月，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从教育家转变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时代变革中共同的教育追求——青年导师

清末民初，由于发展现代教育急需培养新型师资，师范教育发展十分迅速，成为一枝独秀。各地师范学校汇聚了大批优秀学子，位于省城的湖南高师和湖南一师等校，集结了从三湘四水走出来的青年才俊。杨昌济和徐特立在长沙教书期间，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罗学瓚、萧子升、萧三、李立三、李维汉、田汉、舒新城等一代杰出青年正在成长，他们既是杨昌济的学生，也是徐特立的学生，且深受二人思想学说的感召和人格魅力的浸染。可以说，通过教育英才推动时代发展，是杨昌济与徐特立共同的教育追求，也是二人成为著名教育家的主要原因。

杨昌济对青年的影响偏重伦理思想与人生哲学，他在致范源廉的信中说“弟归国后留居长沙，从事教授，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任重道远，方覆一篑而已。”^[19]^[22]著名教育家舒新城民国初年在湖南高师就读，曾回忆杨昌济说“他教我们伦理学及伦理学史，为时不过一年，但他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在行为上，他那虔敬的态度，常常使我自愧疏暴，使我反省到养成‘事无大小，全力以赴’的习惯。……在思想方面，他从人生哲学上，引导我知道中国性理学外之西洋哲学

① 在教育部长范源廉的意见指导下，全国划分为六大师范区，每区保留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分别是：直隶区（察哈尔、热河、山西、山东、河南），北京高师；东三省区（奉天、吉林、黑龙江），沈阳高师；湖北区（湖北、湖南、江西），武昌高师；四川区（四川、陕西、甘肃、云南），成都高师；广东区（广东、广西、福建、贵州），广东高师；江苏区（江苏、浙江、安徽），南京高师。除六所高师外，其余各省原有高师均裁撤停办。参见欧阳哲生等编《范源廉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教育史论·

学说,扩大了我的人生观,而使我知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验着人类有无限的自觉的创造性等等。”^{[20]107}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访谈,言及在湖南一师的成长经历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21]107}另据语言学家黎锦熙回忆,杨昌济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毛泽东、陈昌、萧子升、熊光楚、蔡和森、萧三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毛主席都要到杨怀中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每次同来的人只有十个以下。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杨怀中先生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22]1202}

1917年冬,湖南著名的青年社团——新民学会在长沙酝酿。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到缘起时,指出三个原因,之一是这些青年大都系杨昌济的学生,与闻杨昌济之学说,从而树立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23]1216-1217}1918年4月,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这与杨昌济的主张高度吻合,可以说,杨昌济乃新民学会早期的精神导师。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民学会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时,主事者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抵京后,即住杨昌济家。杨昌济帮助毛泽东谋得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之职,还将毛泽东等人引荐给蔡元培、李大钊、章士钊、胡适等著名人士。杨昌济临终前致信章士钊,极力称道毛泽东与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24]1286}

相比较而言,徐特立对青年的影响偏重平民情怀和苦干精神。曾在第一师范就读的李维汉说:“我对徐老始终怀着钦敬之情。他不仅是青年时代的老师,而且是我终身之师。”^{[25]418}“徐老不仅教学,

而且教人,要求学生德才兼备。他以自己的嘉言懿行进行身教,使学生潜移默化。”^{[25]421}李维汉总结出徐特立办学校的几个特点:一是面向平民,办长沙师范时,录取过刻字工、铁匠和退伍兵等穷苦青年入学;二是面向农村,在乡下多设学校,为农民大众开门;三是极力支持女子教育;四是不仅不把学校作为个人牟利的工具,而且把教学所得节省下来,用到办学事业中去。^{[25]419-420}徐特立曾说自己虽然“在政府方面和绅士方面完全没有地位”,但“在湖南对学生群众有很大的影响”^{[11]143}。1937年1月,延安庆祝徐特立60岁生日,毛泽东致信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26]131}生日庆祝会上,毛泽东又到场发表讲话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27]

五、杨昌济与徐特立教师生涯转型的意义

历史总是在变革中寻找出路,对处于大变局中的人来说,往往是人生道路上关闭了一扇陈旧的门,开启了几扇新奇的窗。只有独具慧眼、敢于尝试的人,才能抢先一步把握机遇,实现弯道超车,快速走到历史的前台,成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杨昌济和徐特立本是基层塾师,在传统社会如果不能中举、中进士,多半以塾师终老,属于历史中的被遗忘者,既无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更不可能走到时代教育变革的前沿。

一个世纪以前,像杨昌济与徐特立这样的青年塾师,通过追求新知,在教育系统内实现生涯转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中国近代教育转型,最初是由高级官僚和士人精英主导的,如洋务教育和维新教育,因办学规模小,且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底层士子基本属于局外人。新政教育转型全面铺开,各地快速建立起新式学校系统,严重影响了塾师们的职业生涯;但对新型师资的需求呈现爆炸式增长,又为塾师们通过自身努力参与教育变革提供了机会。杨昌济与徐特立分别代表了经出洋留学和本土学习而实现教师生涯转型的两种类型。塾师由留学而回国任教者,比如,吴虞(1872—1949)早年在成都唐姓人家坐馆,1905年留学日

本,回国后任教于成都府中学堂、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0年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28]71};陶成章(1878—1912),早年在浙江绍兴设馆授徒,1902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徐锡麟创办大通学堂,曾到芜湖中学任教,后参加革命活动^{[29]369};吴玉章(1878—1966),早年在四川荣县教私塾,1903年留学日本,后曾赴法,1917年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1922—1924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29]522}。塾师由本土深造而进学堂任教者,比如,顾柏年(1870—1939),早年教馆为生,后考入京师大学堂,但因津贴少请假回籍,任小学国文教员,是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父亲^{[30]5};吴景濂(1873—1944),早年辽宁兴城设馆授徒,1902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7年毕业,被聘为奉天(沈阳)师范学堂监督^{[31]1-13};赵声(1881—1911),早年在南京某家馆做塾师,1901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曾任教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和长沙实业学堂^{[29]363}。这些人中,吴虞、吴玉章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吴景濂成为政治家,陶成章、赵声成为革命家,皆一时风流人物,名垂青史。

至于那些固守传统职业、拒绝作出改变的塾师,只能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接受传统教育迅速瓦解所带来的人生困局。因为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社会对塾师的需求减少,地位降低,前程暗淡。尤其是科举被废,基本浇灭了塾师们奋斗多年的梦想。比如,山西太谷塾师刘大鹏(1857—1942),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生还算如意,但面对教育

大转型心态越来越糟,1905年惊闻朝廷下诏废科举时,发出“吾辈生路已绝”的哀叹,日记说“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32]146}“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32]147}“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32]147}“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嗟乎!”^{[32]149}民国成立后,刘大鹏丢馆失业,做不了塾师,迁怒于革命,被革命党人剪发,他以为“此生之大憾”^{[32]181}。到1931年,刘大鹏仍以“清代遗民”自居,对时代剧变“积愤成恨,无处发泄”^{[32]431}。

杨昌济与徐特立两位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塾师,沿着不同的路径,在教育转型中走到了一起,实现了人生的转变与逆袭,殊途同归,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书写了两段不朽的教育传奇,留下了两座永恒的教育丰碑。二人的成长经历表明:教师面临社会转型和教育变革,必须审时度势,密切关注时代所提出的教育课题,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思考和实践作出自己的应对,促进教师生涯与时俱进。唯有这样,才能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走到教育变革的前沿,放大教育事业的价值,实现人生理想。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甘于现状,排斥变革,都只会落后于时代,严重影响教师生涯的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难以在教育变革中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 [1] 李沛诚. 杨昌济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2] 王兴国. 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3] 徐特立. 青少年时代的回忆[M]//武衡, 谈天民, 戴永增. 徐特立文存: 5.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4] 徐特立. 我的生活[M]//武衡, 谈天民, 戴永增. 徐特立文存: 5.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5] 杨昌济. 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M]//王兴国. 杨昌济集: 1.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6] 陈桂生. 徐特立研究: 从人师到人民教育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7] 陈宝良. 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8] 张仲礼. 中国绅士的收入[M]. 费成康, 王寅通,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 [9] 蒋纯焦. 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7.
- [10] 杨昌济. 达化斋日记[M]. 校订本.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11] 徐特立. 六十自传[M]//武衡, 谈天民, 戴永增. 徐特立文存: 1.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12] 陈志明. 徐特立传[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 [13] 湖南学会林立[G]//汤志钧, 陈祖恩.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 [14]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教育志[Z].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 [15] 周秋光, 莫志斌. 湖南教育史: 2[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16] 王兴国. 杨昌济集: 1.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前言.
- [17] 黎锦熙. 瑟僂斋日记[M]//王兴国. 杨昌济集: 2.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18] 徐特立. 挽杨昌济联[M]//王兴国. 杨昌济集: 2.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19] 杨昌济. 致教育总长范源廉书[M]//王兴国. 杨昌济集: 1.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20] 舒新城. 我和教育: 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45.
- [21]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 译.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 [22] 黎锦熙谈话记录[M]//王兴国. 杨昌济集: 2.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23] 毛泽东.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M]//王兴国. 杨昌济集: 2.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24] 章士钊. 杨怀中别传[M]//王兴国. 杨昌济集: 2.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25] 李维汉. 群有师尊党有光: 怀念徐特立老师[M]//武衡, 谈天民, 戴永增. 徐特立文存: 5.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26] 毛泽东. 工作第一, 革命第一, 他人第一: 给徐特立的一封信[M]//武衡, 谈天民, 戴永增. 徐特立文存: 1.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27] 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 徐特立在湖南的教育实践[J]. 人民教育, 1979(3): 31—35.
- [28] 唐振常. 香江论学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29] 王鸿宾, 武修敬. 中国教育大系: 历代教育名人志[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 [30] 顾潮.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31] 吴叔班, 张树勇. 吴景濂自述年谱[G]//近代史资料: 总第106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2] 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M]. 乔志强, 标点.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Reaching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the Path and Significance of YANG Changji's and XU Teli's Teacher Career Transformation

JIANG Chunjia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62)

Abstract: Yang Changji and Xu Teli were rural school teachers in their early years. They belonged to grassroot class, and were busy with their livelihoods. They experienced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teacher careers i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ng Changji was admitted to study abroad with official fees when the new policy of advocating learning was inaugurated. He studied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hanging from a traditional scholar to new type of intellectual; Xu Teli changed from an old scholar to a new type of teacher and school operator through self-study and short-term training in the normal school.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wo, both were teachers of cultivating teacher, involved together in the devotion to nurtur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were called youth mentors. Through the change of identity, Yang Changji and Xu Teli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counterattack in life by growing from grassroots school teacher to the famous educator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Their examples reflect tha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not only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o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but also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Only by adapting to the times and taking the initiatives can we achieve life transformation and career achievement.

Key words: modern times; Yang Changji; Xu Teli; teacher career

(责任编辑: 杨波 钟昭会)